



宋代方志述略

刘 伟 毅

我国地方志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宋代方志在我国方志发展史上又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不仅以数量之多，引人注目，更主要是以志书体例的完备和方志理论的首次出现，以及修志思想的日渐明确，使我国方志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从而为后世方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对宋代方志的研究，就成为探讨我国方志史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空前的修志盛况

在长达一千一百年的汉唐年代，我国各地编撰的地方志总计不足四百种^①，而宋代三百二十年内，全国就修纂了一千零一十六种方志^②，呈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为了便于了解宋代方志之浩瀚，及其存佚情况，现按现行省、区做个简明统计：

存佚情况			
省别	现 存	佚 亡	合 计
总志	5种：《太平寰宇记二百卷》、《元丰九域志十卷》、《輿地广记三十八卷》、《輿地纪胜二百卷》、《方輿胜览七十卷》	35种	40种
四川		180种	180种

浙江	14种：《乾道临安志》十五卷、《淳祐临安志》六卷、《咸淳临安志》一百卷、《澈水志》八卷、《吴兴志》二十卷、《乾道四明图经》十二卷、《宝庆四明志》二十一卷、《开庆四明续志》十二卷、《嘉泰会稽志》二十卷、《宝庆会稽续志》八卷、《剡录》十卷、《赤城志》四十卷、《严州图经》(残)、《景定严州续志》十卷	127种	141种
江西		100种	100种
广东		84种	84种
江苏	9种：《景定建康志》五十卷、《吴郡图经续记》三卷、《吴郡志》五十卷、《嘉泰吴兴志》二十卷、《云间志》三卷、《玉峰志》三卷、《玉峰续志》一卷、《咸淳毗陵志》三十卷、《嘉定镇江志》二十卷	72种	81种
广西		64种	64种
湖北		63种	63种
湖南	1种：《岳阳风土记》一卷	59种	60种
安徽	1种：《新安志》十卷	56种	57种
福建	2种：《三山志》四十卷(亦名《长乐志》)、《仙溪志》四卷	50种	52种
陕西	2种：《长安志》二十卷、《雍录》十卷	26种	28种
河南		23种	23种
甘肃		15种	15种
山西		9种	9种
山东		8种	8种
河北		6种	6种
贵州		3种	3种
云南		1种	1种
新疆		1种	1种
总计	34种	982种	1016种

宋代方志的名称，也很值得注意。既较前代方志的名目大为增多，也不象后世明清方志那样比较划一。它除了传统的志，

编、录、图经、图志外，有称“谱”的（如《永嘉谱》）；有称“统记”的（如《吴兴统记》）；有称“纪旧”的（如《邵阳纪旧》）；有称“故实”的（如《齐安故实》）；有称“类考”的（如《邵陵类考》）；有称“会要”的（如《广东会要》）。此外，还有“新录”、“记问”、“须知”“类补”、“拾遗”、“私志”……众多名目（如《吴兴新录》、《都梁记问》、《剑南须知》、《吴志类补》、《齐安拾遗》、《东阳私志》等等。）这些名目各异的志书，因久已散佚，无法详细了解其记事范围及编纂体例等方面的各自特点，但是可以窥见宋人的修志思想是极为活跃的，不为传统所囿。另一方面，也说明宋代方志虽已出现了完善的体例，但尚未完全定型化，正处于各抒己见、勇于创新的阶段。

二、完备的体例

汉唐方志绝大多数是某一方面的专记，梁启超曾归纳为图经（专记地理）、政记（专记社会政治）、人物、风土记、古迹、谱牒、文征（专记乡邦文献）等七类^③。很少有包罗万象的“博物之书”。自北宋早期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乐史所著《太平寰宇记》问世后，才逐渐扭转这一偏向，并逐渐使方志定型的。

乐史，字子正，宜黄人，太平兴国年间的进士，官著作郎直史馆。他为使赵宋王朝“不下堂而知五土，不出户而观万邦”，全面掌握国情，切实巩固刚刚取得的政权，并进而实现汉唐全盛时期的“华夷大一统”，先后用了八年时间撰写成了著名的《太平寰宇记》二百卷。此书在继承前代地理志书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在记述各道、府、州、县时，创造性地增加了各地的风俗、姓氏、人物、艺文、土产等人文和经济内容，从而使单纯的地理志书，扩丰为历史与地理相结合的方志。这种体例很受学人的重

视与欢迎，因而郡邑志书纷纷效仿。清儒高度评价了《太平寰宇记》在中国方志史上的里程碑的作用，说：“后来方志必列人物、艺文者，其体皆始于（乐）史；盖地理之书，记载至是书而始详，体例亦自是而大变。”^④

著名史学家宋敏求编撰的《河南志》与《长安志》，以内容广博而著称。司马光在元丰六年为《河南志》写的序言赞赏说：“凡其废兴迁徙，及官室、城郭、坊市、第舍、县镇、乡里、山川、津梁、亭驿、庙寺、陵墓之名数，与古先之遗迹，人物之俊秀，守令之良能、花卉之殊尤，无不备载。考诸韦记（即唐人韦述《两京记》），其详不啻十倍，开编粲然，如指诸掌，真博物之书也”^⑤，后者《长安志》，凡城郭、官府、山川、道里、津梁、邮驿，以至风俗、物产、宫室、寺院，纤悉毕具。《四库全书总目》称赞此志博精宏贍，实非他地志所能及。

南宋景定年间马光祖修、周应合纂的《建康志》，其体例颇有特色，多为后世方志所仿效。建康，即六朝古都、今之南京。该志五十卷，分为录、图、表、志、传五部分。其表，以年为经，以类（时、地、人、事）为纬，所载年世甲子，疆域分合，牧守更替、官制因革、成败得失等，一目了然。其志，分为十目，即疆域、山川、城阙、官守、儒学、文籍、武卫、田赋、风土、祠祀等，繁而有序。其传亦分十目，即正学、孝悌、节义、忠勋、直臣、治行、耆旧、隐德、儒雅、贞女等，密而不乱。该志由于内容庞博、脉络井然，被后人认为“体例最佳”^⑥“义例之善者”^⑦。我国方志分列图、表、志、传、考者，其源即始于此。

南宋嘉定年间史安之修、高似孙纂的《剡录》，叙述有法，编例亦佳，极为后人所推崇。剡，为汉代县名，宋之嵊县。该书十卷，首为县纪年，依次为城境图、官治志、社志、学志、寮驿、楼亭、版图、兵籍、山水志、先贤传、古奇迹、古阡、书、文、诗、画、纸、古物、物外记、草木禽鱼。《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评价它，“其先贤传，每事必注其所据之书，可为地志记人物之法；其山水记仿酈道元《水经注》例，脉络井然，而风景如睹，亦可为地志记山水之法”。高似孙是一位博学多闻，精于考订的学者。所著有《子略》、《骚略》、《砚笈》、《疏寮小集》，多有发现。他纂写的《剡录》也就不蹈袭旧例，有了新的创作。一是它的“县纪年”，把嵊县历史上的重大事情，按年代顺序记载下来，成了后来方志中“大事记”的先河；二是该志第五卷“书”中，著录阮裕、王羲之、谢灵运等乡贤留寓十四人的著作，及阮、王、谢三氏家谱之名目共四十二种，成为方志载有地方文献书目的始祖。

绍熙三年孙楙修、曹叔远纂《永嘉谱》，其体例颇有特色。该书二十四卷，立为四谱：年谱，记建置沿革诸大事，以编年为例；地谱，记山川、疆域、名胜、古迹，以分类为序；人谱，记官师、选举；名谱，记物产之种类、名目。《宋史》称赞曹叔远编的《永嘉谱》，“识者谓其有史才”。^⑧清儒孙诒让谓“曹文肃（叔远）《永嘉谱》区分四目，在古地志中实为创例”^⑨。

陆游及其长子陆子虞参修的《嘉泰会稽志》，全书二十卷，所分门类，不用以纲统目的形式，而是以一百一十七个细目予以类分，被后人誉为“详略得中，纪叙典核，而鉴裁精当，亦地志中之极有体要者”^⑩。

据考，北宋以前，我国方志都是县级和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还没有县级以下的志书。南宋绍定三年海盐人常棠（字召仲，号竹窗）受海盐县澉浦镇税兼烟火公事罗叔韶的嘱托，撰集《澉水志》八卷，这就开创了为村镇作志的先河。澉水，系澉浦镇的古称，唐开元五年置镇，到了宋代，这里已成为“民物殷蕃”之地。该志就全面反映了它的历史和现状。全书立有地理门、山门、水门、廨舍门、坊巷门、坊场门、军寨门、享堂门、桥梁门、学校门、寺庙门、古迹门、物产门、碑记门、诗咏门等十五门，卷首冠以镇

境輿图。明代樊维城并作二卷，收入他辑刊的《盐邑志林》丛书中，而收入《四库全书》者，仍为八卷本。清儒周中孚《郑堂读书记补逸》评价它：“叙述赅括，体例谨严，而文尤为雅洁”。

三、珍贵的资料价值

方志之所以被人们重视，其根本点在于它能提供独有的地方史料。宋代方志多数都广搜博采，记沿革、彰贤良、摭故实、征文献、志时政、采风物，因而，它给后世保存下了极为珍贵的史料。如一位农业科学工作者，从十二种宋代方志中，发现有籼粳稻品种155个、糯稻品种57个、共计212个品种，从而掌握了我国历史上较早的最多的水稻品种资源^⑩。

又如《仙溪志》卷一较详细的记载了仙游县的物产：“县境依山濒海，故水陆之产，足于他邦。五谷之种，随所宜树；六牲之物，随所宜畜。酒则以秬为麴，盐则制竹为盆。货殖之利，则搆蔗为糖，渍蓝为淀。红花可以朱，茈草可以紫。布帛之幅，则治麻与蕉，织丝以紵。纱出于土机者最精，绸鬻于蚕户者为良。用物则窠蜂而取蜜，且溶其房以蜡。灰礲而柔竹，则蒸其屑为纸，炼铅而粉，采柏而烛，凝土而燔之窑，则埏埴之器通于二邑，煮铁而出之模，则鼎釜之利及于旁郡。”这段文字，逼真地反映了南宋时期仙游县的物质生活，是十分难得的资料。

再如《吴郡志》记载了农具和渔具的种类和式样，以及农民开渠浚湖的事迹，极为珍贵，是研究中国农业史的重要资料。该志关于虎丘的记迹，除了详载其景緻、形势、掌故、古迹外，还辑录唐宋名人为虎丘写下的诗文，不仅给虎丘增添了光彩，还为了解和研究虎丘保存了丰富的资料。

淳祐《临安志》卷十所载的至和三年吕昌明重定的浙江“潮候”表，极为珍贵。吕氏根据长期实测的结果，将每月海潮涨落

的时辰和潮汐的大小程度记录下来，对于往来船舶适应潮汐涨落避免不测，有着极大的实用价值，元代宣昭从《临安志》中发现潮候表，如获至宝，将其刻在石碑上立于钱塘江边，方便了人们注意潮候。吕昌明的这个潮候表，比欧洲最早的“伦敦桥涨潮”表要早两个世纪，受到国外科学家的高度评价。^⑫

宋敏求的《长安志》，既考订了长安故都的古迹，且又记述了雍州所辖的长安等二十四县的城郭、官府、山川、道里、津梁、邮驿，以至风俗、物产、宫室、寺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此志精博宏贍，旧都遗事，藉以获传，实非他地志所能及”。清代史学家王鸣盛读后感叹地说：“美哉？先生才之大而思之深超出乎流俗绝远也”。

常棠《澈水志》对海岸侵蚀地形的记录，是研究我国古代地理学史的重要史料，更是了解浙江沿海地理的宝贵资料。常棠说：“旧传沿海有三十六条沙岸，九涂十八滩，至黄盘山上岸。去绍兴三十六里，风清月白，叫卖声相闻。”但到了宋代，黄盘山却变成海中孤岛。他说：“黄盘山邈在海中，桥柱犹存。淳祐十年，犹有于旁滩潮里，得古井及小石桥、大树根之类，验井砖上字，则知东晋时屯兵处”。

再如《嘉泰吴兴志》，卷五“河渎”分别载明了湖、潭、溪、涧、洲、浦、川、水、汇、湾、漾、泾、渚的位置、发源、流程、周广及其利用，反映了当时水利事业的情况。卷二十“物产”，记载柑桔较详，说“柑有乳柑、沙柑、青柑、山柑、注柑、朱柑、黄柑、石柑”；“桔有朱桔、乳桔、塌桔、山桔”。对研究柑桔的发展历史，极有参考价值。

在我们今天对外开放、搞活经济时，重温宋代方志中海外贸易的盛况是大有裨益的。《赤城志》、《三山志》、《四明志》都有关于海外贸易的记载。如宝庆《四明志》反映了宋朝与朝鲜、日本、越南的贸易，并列举了上百种的交易物品及其商税数

额。类似这样有关自然和社会的资料，无疑都是宋人留给后世的宝贵财富。我们应该珍视它、研究它、利用它。

四、首创方志理论

历来学术界多认为方志学创立于清代的章学诚，但实际上方志学的若干理论发萌于宋。虽然宋代没有方志理论的专著，但从当时的地方志的一些序文、跋语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宋代学者，都努力从理论上阐明或探讨方志的性质、功用和编纂方志的原则和方法，而这种情况在宋代以前是没有的，因此尽管这些理论是不系统、不完整的，但其首创的意义则不能低估。

关于方志的性质，当时就有人认为属于史的范畴，是一地之典籍，具有资治、补世的功能；而不能说是简单的地理书。编纂《合肥志》、《广陵志》的郑兴裔认为：“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所以察民风、验土俗，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甚重典也”。^⑬编修《恩江志》的陈丰元认为，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地方志的话，“治政者无所稽考”。^⑭林虑在元祐七年写的《吴郡图经续记》后序中称赞说：“举昔时牧守之贤，冀来者之相承也；道前世人物品之盛，冀后生之自力也。沟渎涤浚水之方，仓庾记裕民之术，论风俗之习尚，夸户口之蕃息，遂及于教化礼乐之大备。于是见先生（朱长文）之志，素在天下者也，岂可徒以方域輿地之书视之哉！”他们都高度评价了志书的资治作用。

马光祖在景定二年写的《建康志·序》说：“忠孝节义，表人材也；版籍登耗，考民力也；甲兵坚瑕，讨军实也；政教修废，察吏治也；古今是非得失之迹，垂劝戒也。夫如是然后有补于世”。“岂徒辨其山林川泽都鄙之名物而已”！他们的论述，都把地方志对巩固政权、维护封建秩序的作用，给予充分的肯定。

编纂方志的原则是什么呢？赵彦若指出，要“干于治而施于

用”，就是说要有助于政治，适用于社会。对于千年之往事，赵彦若主张不能没有详简之分别，应该“远者严谨而简，近者周密而详”。^⑤用我们今天的习惯说法就是“详今略古”了。那时就主张编修地方志要“详今略古”，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如何才能编好一部地方志呢？周应合总结了自己编纂《景定建康志》的经验提出：一要制订严谨的凡例，二要有明确的分工，三要广搜博采，四要精心订正。其中他特别强调“搜访不厌其详”，“凡自古及今，有一事一物、一诗一文，不以早晚，不以多寡”，要一律搜集。今天看这些经验，当然不够全面和完善。但产生在八百多年之前，应该说是很不容易的。

五、宋代方志繁荣的原因

唐末藩镇割据和五代十国的分裂动乱，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赵宋王朝统一了中国的大部领土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使我国封建社会内部从庄园农奴制向封建租佃制转变，推动社会生产走向一个新的更高阶段，使宋代成为中国古代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⑩就是靖康之难，宋室南渡后，由于金辽长期攻伐无力南进，南宋的经济文化也有了巨大发展，这就为地方志的繁荣提供了十分有利的社会条件。

其次，赵宋王朝为了维护一统、巩固基业，特别重视对方志和舆图的编纂、收集。宋朝除了沿用唐代编造图经的规定外，据不完全统计，在开宝四年、太平兴国八年、淳化四年、至道三年、咸平四年、景德四年、康定元年、嘉祐二年、熙宁四年、元丰八年大观元年和嘉定年间，都曾颁发过关于编纂或征集方志、舆图的诏书谕旨。如景德四年二月，宋真宗要阅览《西京图经》，因为不备，遂诏各路、州、府、军、监编绘图经。各路把图经上报朝廷以后，真宗命知诰孙仪、待制戚纶等人校定。孙仪以其体制不

一，遂加例重修，命翰林学士李宗谔、知制诰王曾领其事。直至大中祥符三年十二月，才完成了一千五百六十卷的《祥符州县图经》。次年八月命中书门下牒另外写录一部，共三百四十二本，分别颁发给各地。^⑩再如，大观元年，朝廷创置九域图志局，命州郡编纂图经。^⑪类似这样的情况，可以说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再次，宋代的史学异常发展，也是宋代方志所以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宋代学者多精史学，史学著作极为丰富。纪传体者，有《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编年体者，有著名的《资治通鉴》；《通鉴纪事本末》的出现，使史学著作首次产生了纪事本末体；郑樵的《通志》又创造了一种新形式的通史，等等。作为历史学一个分支的地方志，当然不能不受其直接的影响。事实上许多学术名流（如司马光、陆游、范成大等），或直接参与了修志，或以写序作跋的方式，表示了对地方志的支持。

综观我国的宋代方志，数量之众多，义例之完善，对后世影响之巨大，都是前所未有，永不泯灭的，值得我们学习、研究和继承。

但它和宋代其他文化一样，是为统治阶级所掌握、为统治阶级所利用的。必不可免地有其阶级局限，含有封建性的糟粕。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它，这是一种历史现象，降低不了它的历史价值。我们应该吸取精华，剔其糟粕，在继承历史遗产的基础上，努力创造新的社会主义方志学。

注：

①《隋书经籍志》引自南齐陆澄《地理书》和萧梁任昉《地记》称，汉魏六朝的地方志有二百四十四种。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载，隋唐方志约一百种。合计不足四百种。

②据《中国古方志考》统计。

- ③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 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六十八。
- ⑤《司马温公文集》卷六十六。
- ⑥嘉庆重刻景定《建康志》孙星衍后序。
- ⑦喜庆重刻景定《建康志》钱大昕跋。
- ⑧《宋史》曹叔远传。
- ⑨《温州经籍志》卷十，《温州文献述概》（《文澜学报》第二
第一期）。
- ⑩周中孚《郑堂读书记补遗》卷十二。
- ⑪游修龄《方志在农业科学史上的意义》（《中国方志总论》）
- ⑫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第786页：“说到潮汐表的系
统编制，中国人显然早于西方，照我们已见到的说，至少可以追溯到九
世纪”。
- ⑬《郑忠肃奏议遗稿》下。
- ⑭《中国古方志考》第580页。
- ⑮宋《长安志》赵彦若序。
- ⑯关履权《两宋史论》。
- ⑰《玉海》十四“祥符州县图经”条。
- ⑱《宋元四明方志余考》大观明州图经。

作者工作单位：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